

# 20 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

陈明光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财政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贯受到重视,先秦诸子关于富国强兵、节用、薄赋敛等议论就是针对财政问题而发的。自《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以来,有关古代财政活动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从而构成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为 20 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财政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20 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学术史大体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加以评述。

第一阶段是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末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 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 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 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 年)、杨志谦《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 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 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 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 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 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 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 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 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

《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的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杂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 and 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

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著。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林宝清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是一套以我国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资料书。孙翊刚、徐世钜、左步生等选编的《中国财政资料选编》三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1989年)、国家税务总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1-1995年陆续出版。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高等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 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 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 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 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 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廩、府库、专卖、和籴、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

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籴、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

四、整体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为出版一批断代体裁的财政史新作。如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内容丰富,资料详细。其《引论》专论财政体制,叙述的财政收支项目较多,还以专章论述屯田、漕运、货币与财政、财务行政与上计吏、官奴婢、刑徒、奴隶劳动等,力图展示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不过,该书仍如此前不少中国古代财政史教科书一样,对汉代的收入与支出按项目分别加以叙述,受这种论述框架的局限,便无法对汉代四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收支对应状况及其对策做出应有的交代和分析,是一个缺陷。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论述西汉财政制度,内容以西汉为主,上及秦代,下及东汉,论述框架有特色。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以唐代前期国家预算的法制形态、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动、唐代财政收支的阶段性平衡状况为主要线索,力图从总体把握唐代财政体系各个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注意将唐代的主要收支、各种财政现象及改革措施等置于预算体系中加以分析,从新的角度构架了唐代财政史,论述框架、研究角度和史实阐述等均有特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001年)五册,200余万字,空前详细地论述唐朝的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研究对象空前广泛,实证色彩非常浓厚。特别是全书论述框架以财政机构及其职能演变为主体,唐前期以“支度国用”的度支司为核心,唐后期以“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三司体制的演变为主线,深入细致地阐述唐朝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其研究思路和谋篇布局均具特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上下册,分三编十八章系统地阐述宋朝财政,资料详实,计量分析突出,对两宋财政发展史的动态把握以及对财政管理体制的论述尤有特色。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为第一部断代区域性财政史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孙吴财政的财源类型、财政特色,东晋财力的主要来源及其配置,宋齐梁陈财政制度的沿革、财政结构的变化等。同时也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六朝四百年间各个历史阶段的财政兴衰状况,分析了财政兴衰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的关联。此外,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用2章论述元代财政,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洞冶课、盐茶酒醋课、常课和额外课、科差等,财政支出则有军费、官俸、皇室用费、赏赐用费和佛事支出等项目,同时论及财政官员的设置。总之,这些断代体裁的财政史专著或专篇的产生,大多具有专题研究的前期成果和较好的断代史基础,它们既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整体性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也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专门史,与其他专门史一样,仍然必须十分重视断代史研究乃至中国通史研究,才可望进入“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历史学与财政学交叉的学科,其学科特色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反映尚不鲜明。现有的出自历史学界的不少成果,还不太注意运用财政学的概念或理论去阐述古代财政的史实;而出自财经学界的论

著,则有不少在史料的挖掘与辨证上不够下力气,以致论证流于一般,阐述比较空泛,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有的缺乏断代史或者中国通史的必要基础。因此,如何从史论结合、学际交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强化中国古代财政史的交叉学科特色,是今后应该努力加强的事关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第二,与上述状况相关,教学活动与科研成果未能及时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学界与财经学界从事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或教学的学者之间的沟通、协作不够,也就是说,投入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人力、物力的整体优势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三,选题从时序上看存在较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大体来说,对汉、唐、宋、清代前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对春秋战国、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辽西夏金元、明等朝代财政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第四,研究的视角、思路尚须拓展,除传统的收支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以往关注很少的古代国家财政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古代财政需求与经济增长、古代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财政考虑、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财政的特征等问题,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史实论证,其实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令人高兴的是,21世纪伊始,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就呈现蓬勃之象,如除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的刊行,还有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以及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中译本(三联书店,2001年)面世。继尹湾汉代东海《集簿》竹简的出土、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的陆续整理刊布,湘西又发现数万枚秦国地方官署档案简牍,此类新资料都是有望改写秦汉财政史、三国财政史的稀世资料。同时,有一批学者正在协作编撰《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和多卷本《中国财政通史》、《中国审计通史》等大型著作,这些工作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更上一层楼。

##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 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田 静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临潼 710600)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8月11至15日在西安召开,来自英、韩、日等国和我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21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届年会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提交论文数量多,质量高。会议共收到论文(含提要)175篇,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秦汉政治与制度,秦汉学术与文化,秦汉简牍与考古,秦汉农业与科技。